

及不断增加的压力的时刻,组织化劳工正处于危机之中。成员数的减少及其过去30年在资本重构中的共谋行为,使得工会领导层之间矛盾重重。正如金·穆迪指出的那样:“当所有减缓、停止甚或彻底改变劳动者权力丧失的状况的努力和战略失败后,挫折感便爆发了。”

最大的“组织化”工会——“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对其他工会展开攻击,并进行了一场内部压制运动,“变革谋胜利”(2005年7月从美国劳联—产联中分裂出来的工会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是其附属工会。——译者注)因而发生分裂。正如“劳工复兴中心”的比尔·弗雷彻指出的,工会在面对茶党的挑战时无疑“不知所措”。“而且,不知如何应对茶党的另一面,就是不知该如何去督促奥巴马。”

保尔·哈里斯和谢默斯·米尔恩都曾在《卫报》上撰文认为,民主党需要一个自己的茶党来推行进步政治。尽管有些过分相信“进步政治”,但他们也的确触及核心问题。数百万人动员起来不顾一切地寻求变化,通过奥巴马的竞选来寻求代表权,这表明美国人并非都是冷漠麻木的,也并非都是右翼。在可能发生一些不同的情况时,他们能够参与其中并发挥影响。哈里斯和米尔恩之所以可能感到失望,是他们曾经期望民主党本身能够重燃这种热情,奥巴马竞选的成功让他们感到将会优先考虑美国工人的利益。但奥巴马政府显然不能也不愿意挑战大企业和富人的优先权。

然而,其他一些运动可能会对现状形成挑战。2010年5月,几十万人再次为移民权利进行游行示威。20万人(这远远超过参与茶党任何集会的人数)在华盛顿抗议亚利桑那州新通过的种族主义立法,该法案允许警察对他们怀疑为非法进入美国的任何人的移民状况进行质询。但关键的是,任何能够对美国资本主义,(仅仅是在一个不同政府的领导下对福利和工作进行更为野蛮破

坏)形成挑战的运动,必须以工会内普通成员积极性的出现,以及数百万未参加工会的美国工人的草根组织为基础。他们是在压力最大的场所工作的工人,包括400万呼叫中心工人、医院中300—400万甚或更多的有工会会员资格的非组织化工人、130万在沃尔玛工作的工人、近40万没有工会组织的肉类加工业工人。当然,还包括南方地区数以百万计没有任何工会代表权的制造业、交通或服务业工人。

美国的劳工斗争史表明,压力在某种情况下会爆发。美国劳联—产联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代表世纪之交新近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利益和斗争,它采取的压制性策略最终导致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建立,作为一种新的力量来推动产业工联主义的发展。导致工会领导层之间纷争不断的官僚主义的怯懦性,现在已经使得他们不再适合引导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

无疑,工人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迫进行大规模斗争,正如作者新近指出的那样:“茶党的拥趸希望取消医疗保障,这可能会激起另一人群的愤怒情绪。毕竟这意味着有些人所需要的东西会被剥夺。”奥巴马的两党赤字委员会建议到2020年前减少公共支出3.9万亿美元,这将会对许多美国穷人的生活造成巨大威胁。如以往一样,问题的核心在于斗争形成的任何组织能否在其周围聚集起更为广泛的阶级力量。围绕福利侵蚀以及移民问题而进行的重要斗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替代焦点。它不仅赋予工人以信心,而且暗示着危机的解决方案和一个不同的未来,而非是对过去民粹主义的缅怀。■

[于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责任编辑 丁海)

匈牙利政治经济形势解析

[匈]雅诺什·科尔奈 著 袁艺舟 译

一、民主

1989年、1990年至2010年夏季这段时期,匈牙利曾是个民主国家,而现在却不是了。专制乃是匈牙利今日的政治形态。

这个判断只有在解释民主的含义后才能立足,尤其是因为民主的定义会有不同的版本。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曾在其官方意识形态中将民主定义为“人民民主”,西方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被斥为是虚假的。而现今的匈牙利掌权者则声称他们的统治才真正体现民主。

然而,口号和理想(“让人民做主”)并非是我对民主作出定义的依据。请看这个通常被认为是发达民主国家的名单: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日本。这些国家实际表现出的共性有哪些?民主的关键不在于宪法条文、传统与历史惯例所体现的特点,而在于民主政体如何实际实施这些特点。

民主的基本特点包括:

- 权力被严格分立;
- 某些重要的政府职能由独立于政府以外的机构行使;
- 小部分被任命的官员群体和大规模的公务员与公共部门员工得以明确区分,后者的工作独立于政治变革之外,不受政治变革

2011年1月6日向匈牙利《人民自由报》刊登了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题为《清算时局》的文章,批评了匈牙利执政党的政治经济政策,认为匈牙利政府正变成普京式政权,对匈牙利的民主、新闻自由、法治等制度形成很大威胁,文章内容如下。本文译自英文翻译版。

匈牙利新国会组成还不到8个月,执政党和新政府的言行已经把全国的政治生活、政府工作和经济搞得混乱不堪。昨日的政治方针带来的冲击还未平息,今天却又要朝令夕改,这实在令人不解。这反复无常的政治旋风让人简直无法泰然处之。

新政府就职时的匈牙利是如何陷入困难境地的,这需要另行研究。哪些人、哪个政治人物、哪个党派、哪些利益集团应当负责,应当负怎样的责任,涉及哪些以前的政治经济进程,本文不去涉及这些问题。笔者仅就新的执政党和政府于2010年春季就职以来的行为加以评述。

本文涉及八个可能,足以揭示这些最重要的变化的领域。笔者无意去揭示新的问题,在讨论每个领域的过程中,将援引该领域的其他学者的观点,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几乎肯定比笔者详细。本文的目的是对匈牙利的时局进行一个清算和总结。

的影响；

●权力制衡原则得以实施。任何一个权力分支或政府部门在其他分支和部门的制衡下，无法长期独占权力；

●国会实施法案之前，要进行广泛的辩论与协商，继之以全面而旷日持久的国会辩论。在某些国家，先期协商的过程会受到法律的硬性规定，但是在要求先期讨论与协商以及细致、负责的议会辩论方面，民主政治文化比法律条文的力量还要强大。

以欧尔班总理为代表的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青民盟给民主以及过去20年匈牙利实现的民主的基本特征带来的损害，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包括如下方面：

一切决策都来自“权力中央”。

在法案实施前不再进行广泛的探讨和协商。国会变成了像流水线一样飞速通过法案的投票机。

匈牙利国家元首——共和国总统这一职位不再由超越政党派系、象征国家统一的人物担任，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逢迎、顺从的党徒。

首席检察官这一关键岗位由执政党的一位可靠支持者担任。

监督选举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在任期未滿时被新的委员会取代，其成员现在几乎全是青民盟支持者。

宪法法院是宪政的主要维护者和司法独立的基础，其权力被大肆削减，这种自缚手脚的做法是对制衡原则的致命打击。

匈牙利独立财政委员会批评政府计划，结果被解散。被指派为国家审计署署长的并非思想独立、声名显赫的专家，而是执政党集团的忠实成员。同样被任命的还有经济竞争局的局长与两位副局长。

政府指派新的政治人物担任国家重要机关的领导，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实际上发生的是严重得多的政治清洗，置公务员系统应当相对独立于政治的原则于不顾。现在，一项新的法令已经通过：能够无需听证即可让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解

职。政治领袖的威吓令国家机关里人心惶惶，一意奉承。

民主的终极考验是执政的个人、集团或党派下台的程序。民主的基本准则是非暴力：行刺暴君、军事政变、奸党阴谋、群众暴力示威逼迫政党下台、流血的起义或革命，这些都不需要。权力通过竞争党派之间的选举，和平而文明地移交。和其他的民主过程一样，结果必须在事件发生后才能确定。经过实践证明，在1990—2010年春季期间，匈牙利选民通过干净的选举完成了几届政府的新旧更替，匈牙利的政治结构经受了权力交接的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权力自动更换。问题不在于每次选举都走马换帅，而在于解除权力的可能性。掌权的政治领袖是否将权力巩固到了无法被解除的地步？这并不局限于像德国纳粹这样的集权政府。类似的例子还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匈牙利霍尔蒂独裁政权。在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国会定期召开，有合法的反对党，数支党派参加选举，但国家和政治环境被严密组织起来，使得霍尔蒂时期的每次选举都能够让执政党派自动获胜。这种政治秩序保证了执政者的权力不可解除。

今日的匈牙利是否已经落入同样的境地？这样的判断恐怕言之过早（而且令人痛心）。即使青民盟在未来的选举中再次获胜，仍不足以下此结论。只有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才有可能对解除权力的程序考验作出判断。目前可以提及的是，维克托·欧尔班在选举前已经声明，必须控制好匈牙利的政治形势，以保证至少未来15年至20年执政党的地位不动摇。自掌权伊始，执政党已经采取了不可逆转的手段来实施这项计划。他们已经摧毁或者动摇了保证权力的可解除性原则的各种机制。而且，在这短暂的时期里，他们并没有用完所有的手段。我的意思并非是替他们出主意，因为执政党对这些手段必然也是了然于胸的：改划选区以便使执

政党得益，通过新的选举法削弱反对党，给予国外定居的匈牙利人选举权，等等。

二、新闻自由

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是政治制衡的要点。媒体常常在民主国家被叫作立法、行政与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为了防止政府掌握无限和不可控制的权力，新闻自由不可或缺。自由媒体可以揭露对权力的滥用，窥视政治事件背后的内幕。如果政治家的宣言误导了民众，或者对重大事件缄默不语，那么，自由媒体可以揭露真相。

针对媒体的新法规，即对媒体管理部门的制度性调整以及新闻法的通过，公共媒体与政治传播体系的中央集权被提升到新的程度。媒体管理局有权力下达法令，可以实施经济惩罚。管理局不仅有权力控制国有媒体，而且私营媒体也在其管辖之下，包括电视、广播、纸质传媒、互联网与博客等等。完全由青民盟代表构成的媒体管理局掌握着电视与广播的频率，如果电视台或广播电台的频率申请被拒，则意味着该台要关闭了。私营媒体拥有者不愿意批评政府，这不仅可能造成申请更新经营许可证失败或面临重罚，而且可能造成来自“权力中央”关系密切的企业的广告收入的流失。

争取新闻自由的战争还远未结束，但欧尔班政府已经打赢了第一回合。即使他们没有实行这些新的法规，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具有强大的威慑效果。当然会有些勇士（目前已经看到一些）敢于承担风险，但是我们绝对有理由担忧，媒体拥有者、编辑和记者会放弃批评政府的立场，注意措辞，保持缄默，进行自我审查。公共电视广播节目已经被扭曲：一些重要的新闻（常常令当局难堪）现在已经不再播出或者轻描淡写，反对意见也没有得到公正的反映。而且这还只是序幕，这一新生的“媒体帝国”还没有开始对反对者进行公开报复。

三、法治

青民盟以合法有效的途径上台，其所作为也大多是合法的。所以狭义上讲，合法性仍然处于支配地位。

但对问题的描述不应止步于此。如果现行法律碍手碍脚，政府就会改写法律。如果政府想要对某些个人或团体法外开恩，也会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行使特权。如果当局施行的法律与宪法抵触，就会修正宪法（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不下10次）。而如果背负着众多信笔写来的修正案的宪法仍然阻挡了政府的脚步，当局会废止旧宪法，颁布一部新宪法。目前，当局已经不止一次冲破了法律的约束。例如通过了关于国会议员的一项法案，以便绕开法律强制要求的协商程序。不仅如此，政府还公然蔑视匈牙利和欧盟之间的法规、匈牙利宪法以及法治国家在重大事务上的基本要求。

法治的原则宽泛而复杂，很难用数学的方式去定义。但是民主主义者会感受到法治的精神。它意味着对宪法和现行法律的尊重，即使这些法令并非是由当权者所制定的。法治意味着法律保障被实施，公民权利受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保障持续而稳定，不会被政治决策者的一时冲动所剥夺。

借用这个广义上的“法治”概念，我并非宣称匈牙利已经不是法治国家了。过去几个月里，重要的法律保障已经被摧毁，尤其是对宪法法院的粗暴践踏。新的政治领袖公开地试图对检察官指手画脚，或者在国会面前传唤大法官。但幸运的是，我们还不能断言大法官的独立地位已经荡然无存，或者与政治有关的裁决实际上被一群被政客操控的法官执行。未来几年将发生的实际情况将揭示司法独立是否能够持续，或者被彻底废除，沦为形式。民众会担忧当调查和起诉与政治有关的案件时，警察与检察部门将来的行为将会如何。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之前的

几个令人失望的例子表明,案件对政府不利时,可能会被非公开审理,嫌疑人如果是当局的反对者,则会遭到不公正对待。我们将拭目以待,希望这些担忧只是杞人忧天。

四、资本主义

让我们将视线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

资本主义体系在匈牙利居于主导地位,笔者确信在整个欧尔班政府执政时期都不会动摇,后欧尔班时代也一样。资本主义是非常坚韧稳固的。

社会主义体系这一历史事例证明,即便资本主义非常强大,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废除资本主义并以另一个可行的体系取而代之,这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只能通过铁的意志去实现,消灭私有财产,全部(或近乎全部)以国有财产代替之;消灭市场调节(或仅仅保留一小部分),在所有经济领域里以政府调控取而代之。当局并未这么做,也没有迹象表明存在这些倾向。青民盟显然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并不以消灭资本主义为政策方针。

人们常常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效率产生错觉,资本主义本身常常被奉为有效分配与利用资源的保障。然而这绝非实际情况。尽管一些资本主义经济非常高效,但其余的则深陷种种摩擦之中。

欧尔班政权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目标相去甚远,反之,它和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得到大企业寡头的帮助,又得到中小企业的支持。它随时乐于进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交换。然而同时,当局对经济的干预令人受掣肘。政府在公开言论中的反资本主义口号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其实际行为对经济的破坏作用则更大。过去8个月的经济政策已经令匈牙利资本主义的效率下滑,削弱了经济实力,减少了发展机遇。

社会主义体系本质上会造成集权,国有财产和国家调控为主的经济为中央计划铺平

了道路。但即使是这样的体系的发展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唯意志论,即“只要决心足够大,便能实现任何目标”。在欧尔班政府的行径里,类似的唯意志论很明显。但尽管他们可能会加大政府干预的范围,更为强势地对经济进行干涉,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原则仍在起作用。匈牙利国内外的经济主体有自己的主张。政府无法强制要求商家出售产品,提供服务,金融投资者也不能被强行要求购买政府债券或凭空产生出资本来。再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对经济的各行各业加以控制。而政府的控制越恣意,产生的结果也就越难以压制,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害也就越大。

五、私有财产

资本主义的大厦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从实际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从理论模型看,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中私有财产都不是唯一的财产形式。其他财产形式也存在,但私有财产是最主要的形式,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与其一体的,这种尊重必须在法规中得到体现,公众舆论的价值判断也应当得到体现。

近来匈牙利个人养老金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府在尊重私有财产问题上的信任。如果是在自由选择的原则下,养老金改革所积累的财富令私有财产缩水,国有储蓄增加,公众的信任倒不会受影响。而这取决于以下条件得到满足:(1)在职员工可以真正进行选择,包括将私人养老金转入公共养老金计划,(2)在比较了关于各种选择的优劣的信息后,因为本人的自由意志而作出选择,以及(3)拥有充足的时间考虑。但这不是实际情况。没有充分的信息,只有空洞模糊的承诺。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只有匆忙的决定。没有自由选择,只有威胁和严重的歧视。仍然选择私人养老金计划的人将部分或完全丧失国家养老金的权利(丧失权利的程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在自相矛盾

的政府公告、浅薄或根本就是虚假的信息包围中,公众被搞得晕头转向,私人养老金计划的参加者们被逼作出将在老年对他们的经济情况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

整个过程让人回忆起前几代人所经历的不幸遭遇。如果农民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私人财产自愿进行合作,农业合作运动和资本主义是非常契合的,即使合作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有所不同。但在20世纪50和60年代没收匈牙利农民的土地并强迫他们加入合作社,正是为了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那些空想出今天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并加以实施的政客不能被指责为想要消灭资本主义。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损害了资本主义的原则,而且离赤裸裸地没收财产也不远了。

六、经济增长与发展

青民盟以及政府所宣布的经济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为核心。没有经济学家会反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乃是社会福利与发展的关键。但发展路径可能互不相同,各有自身的特点,这也是所有经济学家的共识。同样被广泛认可的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采用各种手段,并带来不同的结果与副作用。增长是否是经济政策的核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争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怎样的增长,采用什么手段。

如果能够掌握政府目前、明年、未来几年以及15年至20年(政府计划的任职时间)的真实计划,经济分析预测将会容易一些。当局的口头宣言中充斥着空洞的言辞、不切实际而且没有时间表的承诺以及自相矛盾的想法。更加危险的是,政府的第一份确实的、以数字为基础的“意向声明”,即2011年的国家预算,也没有明确说明政府的计划。因此,不管是从政领袖的宣言中还是从2011年的国家预算中,都不能透析出任何前后一致的经济政策。实际的治理政策并非是通过广泛的专业辩论、对短期和长期

效应的审慎思考以及不同方案的反复比较中得出来的。经济政策制定的专业水准已经下滑到可悲的程度。因为手头没有严谨的经济计划,无法进行前后一致的、严谨的分析,我只能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驳斥一些误导性的说法。

——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总是听到这种论调:政府将要减税,而减税会带来经济增长。但是,很多研究试图证明减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我们无从得知100万弗林的减税能够带来多少GDP增量,以及需要多长时间。但这100万弗林肯定会在政府预算的收入栏消失,而减税造成的赤字必须通过减少支出(即经济紧缩措施,而这与减税的承诺是完全相反的),或者通过贷款(如此一来,则政府的另一高调承诺——控制政府债务又怎么办?)来填补,所以对全社会赋税的整体性减免并不是一个注重实际的计划,而只是重新分配了赋税的负担。由于不能精确计算,我们无法回答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即使某种减税政策的确定造成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和额外的产出,赋税负担的重新分配给长期增长带来的损失一定就小于短期收益吗?的确,家庭(尤其是富裕家庭)会少缴税,但受匈牙利“危机税”影响的企业则必须缴纳更多。而结果仍不止于此,还将波及其他领域。受“危机税”影响的企业将把经济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即其他企业和家庭。企业的利润很可能将减少,而且会带来另一个后果,因为利润是投资的主要来源。这项异常沉重的赋税将可能给金融、制造、贸易等关键行业的短、中、长期商业策略带来深远的影响。如果没有灵活、积极主动而且行之有效的信贷体系,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长期存在。这项令人难以承受的税赋在银行业被加在零散的个人纳税者头上,没有触及富裕的银行家,但却将拖慢经济的积极运转。我们不应只听取公众对银行的抱怨,而应该把目光触及金融界的日常业务;当局已经开始

限制信贷供给,尽管目前信贷至关重要。所有涉及“危机税”的行业都已经开始限制投资,这将最终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起到反作用。

——政府期望劳动生产力尽可能快速增长,科技进步全面开花吗?或者政府想要维持现状,或者恢复因为国际国内竞争而损失的工作机会吗?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大幅增加就业,还是提升产量、生产力以及竞争力?我担心某些政治领袖和他们的宣传班子并不清楚这些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矛盾的,不能将“就业”、“增长”和“发展”混为一谈。

——中小企业是天然应当被赋予竞争优势的生产者吗?如果是,则其他生产者就处于劣势。换个角度,匈牙利的某些与政界套近乎的寡头不正是比对手们拥有更多优势吗?和与政界无关的公司相比,与政界亲近的公司是否更容易拿到政府的合同?或者,竞争应该严格遵循平等原则吗?

——经济史的事实反复表明,如果小国想“独善其身”,通过操纵增加内需来刺激经济,那么,它是无法快速和长期增长的。现任政府真的下定决心放弃久经考验的出口推动增长政策吗?究竟哪个对国家更有利,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还是把民族主义口号挂在嘴边却对国际分工的好处视而不见的做法?

——关于经济增长的金融资源,可以提一些相关问题。孤立主义与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否也要落实到资源的寻求上?当局真的期待用这样的政策带来高速增长?尽管此政策乏善可陈,在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国家倒有可能实现。但如果经济最终依赖于资本的输入,那么孤立主义只不过是傲慢、空洞的口号。很容易发现,以下三个要求是互相冲突的:(1)低储蓄率,(2)高速增长与科技进步必需的大量投资,以及(3)拒绝国际资本。这些要求不仅实际上互相冲突,逻辑上亦然。哪些是政府真正想要的,哪些又只是说说而已呢?

——匈牙利国内商业链应当比国际的享有优先权吗?匈牙利银行是否也应当比国际银行享有优先权?对跨国公司的反对情绪正在酝酿之中。那么是否应当允许匈牙利最大的银行与能源业的巨型企业成为跨国公司,将国内利润投资到海外去盈利呢?

——当局期望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内带来增长,那么“股市博弈”怎么就成了彻底的贬义词了呢?政府发言人说“个人养老金在股市里卷走了参与者的钱”,就好像股票债券投资并不是任何一个储蓄组织正常的、值得推荐的、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必需的举措。按当局的语调,似乎股市投资就像一位粗心大意的父亲在赌场将家里的钱打了水漂,或者一位男爵在赌场将家业挥霍一空。没有了股市或者其他灵活的资本市场机构,资本主义还能存在吗?如果一家企业无法通过发行股票来筹资,还能怎么办?只依靠银行贷款?还是申请政府补助?

——政府有没有充分利用匈牙利作为欧盟成员国从而可以获得欧盟金融资源支持这一由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巨大机遇呢?如果这是当局的目标,为什么又拖延欧盟援助的落实?为什么当局总是和欧盟的各个机构发生冲突,而不是听取建议,虚心接受以审慎的外交辞令传来的批评和警告?

——今日匈牙利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常以凯恩斯主义者自居,但他们的做法毋宁说是一种“庸俗凯恩斯主义”。他们对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一知半解,并且对宏观经济学派之间的深奥辩论置若罔闻。受凯恩斯影响的经济政策当然会包括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建议,尤其是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该思路也会被提及,正如凯恩斯的批评者基于各种令人痛心的历史教训反复强调的,长期的过度财政支出有带来通货膨胀的危险。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生产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但是,凯恩斯并不只是强调用财政手段带来增长,他也强调了经济复苏的动力来自

乐观精神、投资精神和企业家的扩张欲望,即能够激励投资者的、被反复引用的凯恩斯术语:“动物精神”。但是这种乐观的风气和投资精神并没有得到鼓励,反而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而遭到挫伤,这种不确定性包括:私有财产可能何时以及怎样被侵害,何时征税以及税额幅度为多少,私有财产将于何时以及怎样遭到歧视性对待?

请允许笔者说明,这不仅影响了外国投资者,也影响到了本国投资者。一位富有的纳税人在实施单一税率所得税后将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他在投资匈牙利资本市场(例如,用来进行所谓“股市博弈”)时,在购买匈牙利国债支持国有投资而不是购买国外证券时,在将存款存入外资银行时,以及在国内消费时,都将会三思而后行。每一家匈牙利企业在决定如何分配利润进行再投资和分红的比例时都将踌躇。国家经济政策越难以预测,对私人财产的侵犯越多,国内投资的信心就越难提高。

经济界深入探讨过货币稳定、预算平衡、外资流入流出平衡、购买力稳定、可接受的政府债务额、外汇储备的理想水平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目前,这样的探讨变得更为抢眼,因为各国都在寻求解决经济不景气的办法。目前大家达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即经济的财政平衡如果遇到困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对此问题持负责任态度的人士将不会对当局一再宣称的预算赤字不会超过2010年与2011年上限的说法感到放心。这只是金融稳定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尤其对于匈牙利动荡的经济形势而言。经济长期增长的许诺只有在政府说明将在2011年以后采用何种经济政策保证广义上的财政平衡以后才有说服力。不幸的是,当财政平衡的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时,政府为了达到今年和明年的目标赤字水平而计划采用的方法将有可能给未来几年的政府收入与开支带来更大的差异。

七、分配

在竞选活动中,青民盟曾承诺避免限制性经济紧缩。自此官方宣传机器竭力让公众相信青民盟正是这么做的,经济目前没有被紧缩,将来也不会。

但是这仅仅是文字游戏,利用了“限制”这个字眼的模棱两可。一言以蔽之,政府先前的决策与公开的计划实际上会对部分人目前与将来的消费造成实际损失,令其财富与储蓄贬值,债务增加。持续的再分配造成赢家与输家的不断重新洗牌,造成的收益和损失的大小也反复不定。已经承担以及将来可能承担损失的输家确实受到了“限制”,而且属于这个情况的公众不在少数。

那么谁是输家?请让我只列举已经确实承受损失的情况,尽管受损失的群体可能更为广大。而且,一些个人和家庭可能同时遭受了各种损失,不止于以下某一类情况。

——中低收入群体。具体而言,即仅靠工作收入生存,收入水平高于最低工资,却低于每月293450弗林(即1100欧元或1400美元),没有未成年子女。他们的名义净收入将因为税收与收入政策而减少。

——身负外资贷款的人士。因为汇率疲软,负债实际上增加了。政治领袖不负责任的言论、政府公开的经济政策、2011年以及未来预算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与弗林走低的因果关系已经被证明。

——受汽油价格上涨影响的家庭。油价早就应该上涨,任何经济学家都不会真的反对。但是这种做法的可恶之处在于,这不仅与当局自己的承诺相悖,而且政府食言以后还拒不承认承诺的不可靠与不切实际。

——没有出口业务却进口原材料与部件的制造商,其中包括中小企业。制造成本因为汇率疲软而上升,累及销售。

——在经济动荡与重组时期被无理解雇的政府员工。

——受“危机税”影响的行业所解雇的员工。这些行业利用重组和合理化经营来补偿征税造成的成本增加，这意味着开除部分员工，而留下的员工的工作量将要加大。

——因为投资环境不佳而无法找到工作的失业人员。

——将收入储蓄在个人养老基金里的人士。目前这些实际的财富已经被政府剥夺。另外，还有国家养老体系的参加者，政府对他们多年后的养老承诺含糊不清。

——出售不动产的人士。目前市场低迷，政府却用纳税人的钱在供给明显大于需求的时期人为加速房屋建设，令房产价值持续缩水。这令背负外资贷款购买或修建房屋的人士尤其受害。

——消费者，他们被转嫁了很大一部分“危机税”负担。无论政府是否禁止商家进行这种转嫁行为，无论商家是公然还是偷偷摸摸地这么做，税赋都会最终落到消费者头上。

——大多数雇员。目前薪资谈判正在进行。在一些行业，名义工资（按照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原则来制定）的协议已经根据官方的通胀预测而落实。而如果通胀超过预测水平，他们到手的实际工资将减少。

——由于通胀加剧而受害的每一位消费者。欧元政府的经济政策对消费价格的影响如何，对此只有在2011年底才能作出更为明确的判断。目前我们只能看到带有通胀迹象的效果：国家货币走低，用以支付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贷款利率上升，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税赋增加。通胀的损失人人都会承受，但赤贫群体受到的影响最大。政府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正在加剧通胀，而不是相反。央行应对通胀的货币政策将不断受到政府的刁难。

当然也会有赢家产生。但输家并不会因为赢家的获益而感到欣慰。输家肯定会认识到“限制性紧缩措施”的后果，但是媒体的报道角度却已经被扭曲了。

在野时期的青民盟曾以穷人的代言人身份悠然自得地发表民粹主义宣言，批判对经

济有益却不得人心的政府方针。该党希望人民相信他们将把右翼意识形态与新“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熔为一炉。而自掌权以来，这些美好的印象还剩下多少？只剩下几个高调的姿态：某几种身份的妇女的提前退休（这和欧洲大行其道的延迟退休的做法背道而驰），重开几条铁路支线，而不是减少铁路部门的运营亏损。另外，还有两个毋庸置疑的重要举措尚未开始：改变医保与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这些所谓“结构性改革”是否能够改变现状，无人能够知晓。我要说明的是，“土豆烧牛肉”政策时代所建立的经济结构，今天仍然被维持着。

因此，一方面“土豆烧牛肉”模式在青民盟政策中时而出现在，另一方面，对富人有利的税赋与特权正日益凸显。税制改革措施中正浮现出一种“右翼保守”的再分配原则。

这种倾向在单一税率制度中十分明显。收入越高，纳税人受益就越大。家庭的各种收益也会出现类似效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社会保障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税项减免所体现的，所以收入不足以征税的最弱势群体就被排除在这一福利之外了。

再分配包括分配收益与损失，以及当前与未来的损益。一些人天真地认为新的领袖在15年至20年里如此这般，是在用当前的不得人心来换取未来的幸福与可持续发展。但是，并没有这样的迹象。惯例仍在重复：迫在眉睫的问题的确是解决了，但却是被一种“事到临头再说”的态度所左右的。现在一定要弥补2011年预算的亏空了吗？那好，让我们不必考虑投资者的倾向或者未来经济形势，向那些可恶的银行和跨国公司抽取重税吧。让我们不必考虑国家的长期损失，去将个人养老基金的资产搞到手吧。让我们不必担心人均寿命不断增长、劳动力人口比率降低、领取养老金人数不断增加等情况下的国家养老基金的长远未来吧。

我仍然可以举出其他例子，比如国家经济政策选择了将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问题等

方面刻不容缓的问题推给后代，而不是合理地承担起当代应该承担的责任。

八、信任

信任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详尽分析，无法一言以蔽之。

目前，选民的信任还看不到有大量转变的迹象。尽管最近的调查表明有些人在动摇，占总人数三分之一、为青民盟带来国会三分之二多数的选民并没有改变立场。政治预测并非本文的任务。历史经验表明，事物的发展并不一定有规律可循。政党的支持者有可能经年累月而逐渐流失，也可能突然间烟消云散，但政党也有可能长期获得民众的支持。

商界对政府的信任（这与选民的信任不能混为一谈）意义重大。坦率言之，这种信任与该政府是民主制、极端独裁制抑或某种程度的专制无关。即使是在藐视人权的独裁专制下，资本主义也能存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可能更倾向于稳定、高压的独裁，而不是多变、缺乏铁腕的民主，只要前者能够明确支持私有财产，强制合同的执行，以及保证各种权利。资本欢迎新加坡或者中国这样的铁腕政权。

如果预算缺口的补救办法即使在中期都无法实施的话，这种政府宣言的不确定性会动摇商界的信任。无论政府如何激昂地否认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给予的不良信贷评级的意义，不断下滑的分数也反映了全球商界的共同判断。这不仅反映了被动的评估结果，而且对未来发展会造成消极影响。

短期而言，匈牙利如果不能正常出售国债，则无法生存下去。作为债务国，信贷评级的下滑立即造成了上千亿弗林的损失，因为现在出售国债，政府就必须向匈牙利国内外投资者支付更高的回报。即便非常庞大，这上千亿的损失仍然是可控的。而真正的危险在于，信任不仅会下滑，而且可能崩溃。政府不应迁怒于发出警告的人士，而应当重

新审视危险的成因。

长期而言，正如之前所强调的，商界信任的动摇将使经济增长减缓。该过程无法准确量化，但是这一现象是可以感受到的。现有企业的投资环境在恶化，和正常的投资环境相比，目前的创业者数量很少。本土与外资企业变得保守，扩张冲动减弱，而将资本转移他处的想法则变得更为强烈。

总结

政治领域的情况不难总结。一些民主的基本机制已经被摧毁，匈牙利变成了专制国家。匈牙利正变得像普京政权，这令人感到危险。变化的方向很明晰，其深远程度已经无法逆转（或者乐观而言，几乎无法逆转），而且保证了（乐观而言，几乎保证了）当权者的长期执政。

而经济领域则比较难以概括，因为目前充斥着自相矛盾的举措、根本不可能贯彻的法规以及不应追随的倾向。新政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让我们期待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力量能够让其在这些糟糕的经济政策下存活下来。资本主义的确有这个力量，但经济衰弱的代价将是高昂的。

在政治领域，马基雅维利式的目标（上台并长期掌权）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计划明确而清晰。绊脚石被毫不犹豫地踢除。

关于经济，我真的还看不出政府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似乎并没有任何详细的计划可供实施。根据政府的声明，过几个月公众就能够得知关于“结构性改革”的计划，从而理解经济政策的目的。但无论目的如何，在实施过程中已经表现得乱七八糟了。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国家的前途而担忧。■

[袁艺舟：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楚全)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国外理论动态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MEGA²与另一个马克思

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困境

关于全球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替代性观点

支持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源泉

专业化时代的中国政治学研究

东亚的创新文化与创新政策

这将是亚洲世纪吗？亚洲高科技发展状况

美国茶党运动分析

2011.8

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